

合作杂志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

History and Theory (美国)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美国)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美国)

Review (美国)

WE ARE GRATEFUL TO THE

ABOVE JOURNALS

FOR GRANTING US

THE COPYRIGHT PERMISSION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十辑

古代科学与现代文明

Ancient Scienc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主编

陈恒 耿相新

执行主编

王秦伟



大象出版社

目 录

- 144 何为书籍史?
罗伯特·达恩顿 文
- 166 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新版本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 文
- 176 布克哈特:政治观点和在后现代主义边界上的历史洞察力
约恩·吕森 文
- 187 纳粹德国的流亡历史学家:对民主制的诸种政治态度
格奥格尔·伊格尔斯 文
- 202 从季门传承来管窥德国和中国印度学的源流
刘 震 文
- 专题研究**
- 233 马铃薯如何改变了世界历史
威廉·H.麦克尼尔 文
- 245 阿姆撒尔解读
车效梅 文

目 录

- 255 开普敦种族问题新探
潘兴明 文
- 271 论荀彧与曹操集团的关系
王莉娜 曾维华 文
- 280 朱熹《家礼》的刊刻与版本——迄至《性理大全》本
吾妻重二 文
- 301 近世儒教的祭祀礼仪与木主、牌位——朱熹《家礼》的一个侧面
吾妻重二 文
- 讲坛**
- 325 社团与馈赠:罗马帝国城市生活新探
刘津渝 文
- 文献与史料**
- 343 古典世界的货币及其价值
约翰·罗伯兹 文

从季门传承来管窥德国和中国印度学的源流

□ 刘震文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下面所要谈论的学科——印度学的概念和内涵。目前,欧洲、英美和印度本土对这个学科名称和所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鉴于这个学科之所以如此命名源自德国,这里还是采用了欧洲,特别是德国学者的定义;而倘若采用其他地区的定义,那么“印度学”完全可以另外的名称代之,而本文所讨论的并非是印度学之外的学科。

海因茨·贝歇特(Heinz Bechert, 1932—2005)在《印度学入门》中,为该学科在欧洲的定义给出了一个范围,即在“梵文语文学”(Sanskrit - Philologie)和“印度古代文化研究”(indische Altertumskunde)上的延展。其研究范围是所谓的“大印度(Greater India)”的一切文化。^①瓦尔特·斯拉耶(Walter Slaje)在“什么是印度学,它的目的是什么?”一文中定义为:“最广义地说,它无论如何是以文化分析为倾向的一门人文学科,它的分析强调比较,它的对象是一个非欧洲的,并且是一个印度的文化圈。……从以密码形式流传的思想中,语文学的基本方法却为我们展开了这一文明的精神世界——前者作

为后者必须的基础,是有关后者的语言文献。”^②维基百科综合了两者的观点,把印度学定义为:一门人文学科,致力于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描述和解释。^③

笔者认为,既然印度学这个词是由“印度”(Indo-)和“学”(-logie/-logy)而构成,就应该先弄明白这个偏正结构词汇的后半部分“学”(-logie/-logy)。这一后缀来源于“philologie/philology”一词。Philologie/philology(源自古希腊语φιλολογία,意思是“对说话或辩论的热爱”。而它又由φίλος[喜爱的、友爱的]^④和λόγος[说话、词语、谈话、辩才]^⑤前后两部分构成),是对一门语言或者一个语言分支的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统称。^⑥Philologie/philology最早的任务是文本校勘,即从各有偏差的写本中校勘出一部尽可能权威的文本。所以,“语(言)文(献)学”是philologie/philology最为认可的汉语表达。最早的语文学是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学(Klassische Philologie/classic philology)。后来以

此为规范,派生出了一系列研究其他文化的语文学学科,比如英国语言文学研究(Anglistik)、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Germanistik)^⑦等,包括汉学(Sinologie/Sinology)和印度学。^⑧印度学开始于吠陀和梵语的语文学研究,如果考虑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古印度语、现代印度语,以及它们所承载的相应的文化和历史,那么印度学的定义可以为:印度(文化圈内的)语文学和历史、文化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和语文学大家庭的其他学科一样,印度学并非是一门经世之学。哪怕是对现代印度的研究,也应该遵循原先的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方法论,改变的只是研究对象而已,即“现代印度之学”,而非“现代之印度学”。^⑨一旦方法论改变了,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称之为“印度学”,完全可以和英美一样,或将它拆散分到其他各个系科中去,或改名为“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或者和印度一样,将

① “Was ist und welchem Zweck dient Indologi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德国东方学杂志》,以下简称ZDMG)153,2(2003), 第311—331页。

② <http://de.wikipedia.org/wiki/Indologie>.

③ 参见 Hjalmar Frisk, *Griech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3 Bde., Heidelberg 1960, 1970, 1972, s. v.

④ 参见 Hjalmar Frisk, *Griech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3 Bde., Heidelberg 1960, 1970, 1972, s. v. λέγω.

⑤ <http://de.wikipedia.org/wiki/Philologie>.

⑥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些学科名称没有英语对应。确实,英语中并没有类似于Anglistic的词汇来对应德文的Anglistik,如果要勉强为之,只有“English studies”,即“英国研究”。

⑦ 斯拉耶认为,印度学之所以没有用定义单一语言研究的-ist或-ik作为学科名称后缀,就是因为印度文化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见“Was ist und welchem Zweck dient Indologie?”,第317页。

⑧ 同上,第331页。

① *Einführung in die Indologie*, eds. Heinz Bechert & Georg von Simso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9, 21993, §2, §3. 按照斯氏的观点,这个“大印度”文化圈包括中亚、东南亚和西藏等一切文化被“印度化”的地区。

二

为了能进一步理解这门学科，有必要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史。阿尔伯特·图姆布 (Albert Thumb, 1865—1915)^② 将它分成七个阶段：

序幕(传教士和旅行者时代)

17—18世纪旅行者和传教士学会了某种印度语言，对印度文学做过些报道。1651年，荷兰传教士亚伯拉罕·罗杰 (Abraham Roger) 在其作品《向隐藏的异端敞开的大门》(*De Open-Deure tot het verborgen Heyendom*) 中，对婆罗门文学和Bhartrhari的格言做了报道。后者又为赫尔德 (Herder) 所用。1667年，罗特 (Heinrich Roth) 用天城体字母 (Devanāgarī) 编写了第一本西方人的梵语语法。18世纪初，耶稣会的教士约翰·恩斯特·汉克斯来顿 (Johann Ernst Hanxleden) 用拉丁语写了第一部梵语语法 (*Grammatica Granthmia seu Samskrumica*)，但未出版。而奥地利的传教士巴尔托罗梅奥 (Fra Paolino de St. Bartholomeo) 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欧洲先后出版了两部梵语语法书，他也是西方第一个梵语语言学家、文献学家。

英国—印度时代

系统地研究印度的文学和语言始

于18世纪末期，起先出于实用的目的：了解印度当地的法律。一些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人，在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的倡导下，为了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治久安，从事梵文的语言和文学研究。其中的佼佼者有三位：查尔斯·威尔金斯 (Charles Wilkins)、威廉·琼斯 (William Jones)、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 (Henry Thomas Colebrooke)

威尔金斯 (1749或1750—1830) 翻译了《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 1785)、《利益示教》(*Hitopadeśa*, 1787) 和《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 中的“沙恭达罗 (Sakuntalā)”插谱 (1795)，还有梵文语法 (1808)，首次在欧洲用于梵语教学。他是能将印度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的第一人。较之更著名的是东方学家琼斯 (1746—1794)，他创立了孟加拉亚洲协会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784)，1789年翻译出版了伽梨陀娑 (Kālidāsa) 的《沙恭达罗》，其德文再译本为赫尔德与歌德二人所激赏。他还翻译了《时令之轮》(*Rtusa māhāra*)、《摩奴 (Manu) 法典》。另外还提出了梵语与欧洲古代和现代语言以及波斯语具有相似性的假设，并证明过古代印度和希腊罗马神话的相似性。作为琼斯的继任者，科尔布鲁克 (1765—1837)

是印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奠基人。1798年，他撰写了《印度法律有关合同和继承方面的摘引》(*A Digest of Hindu Law on Contracts and Successions*)。此后，他致力于印度的宗教、哲学、语法等科学的研究。1805年撰文介绍吠陀，出版了《阿摩罗字典》(*Amarakośa*) 和波你尼 (Pāṇini) 文法，收藏大批印度的写本。

欧洲大陆古代印度研究的开始

德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与浪漫主义紧密相关。

在印度学梵语的英国人中还有海军军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因为拿破仑战争，他被强留在巴黎，在那里他认识了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 (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当时在德国只有印度文学作品的再译本，但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施莱格尔跟从汉密尔顿学了梵语，其成果就是印度学的奠基作品《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 1808)；而一年之前，他已经将《利益示教》译成德语，这也是第一部直接翻译成德语的印度文献。一个新学科的学术规范由此树立。他的兄长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 受其弟影响，成为德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梵文学者。大施莱格尔的梵文也是在法国巴黎学成，老师是法国的第一位梵语学者谢赛 (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 1773—1832)。1818年波恩大学成立，并为大施莱格尔设立了德国第一个梵语教授的席位。1823年《印度图书馆》(*Indische Bibliothek*) 杂志由大施莱格尔创办。他还编辑和翻译了《薄伽梵歌》(拉丁语)；编辑了《罗摩衍那》(*Rāmāyana*)，但未完成。

与比较语言学相关的梵语研究

与施莱格尔兄弟同时代学习梵语的还有弗朗茨·波普 (Franz Bopp, 1791—1867)。他翻译了一些《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插话，最著名的莫过于《那罗 (Nala) 传》，其成为了欧洲各大学梵文学习的第一篇阅读课文，但他的兴趣主要在语言本身。他曾经编有一系列梵语语法和词汇表，最主要的著作是《比较语言学》(*Vergleichende Grammatik*, 1833—1852, 第三版 1868—1871)。自1821年起，他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成为印度日耳曼学 (Indogermanistik) 的奠基人。虽然前人对比较语言有所提及 (比如琼斯)，但波普于1816年所发表的《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成为印度日耳曼学的开山之作；该作品发表之后，该学科就正式步入了学术殿堂。此时，德国印度语文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的研究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包括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印度学家阿道夫·弗里德里

^① 斯拉耶将脱离的语文学的、追求实用的研究者比作只知道胡椒和传教的葡萄牙人。见“Was ist und welchem Zweck dient Indologie?”, 第329页。

^② *Handbuch des Sanskrit. I, 1: Einführung und Lautlehre.* 3. Aufl.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58, § 41; Das Studium des Sanskrit in Europa.

希·斯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 1807—1887)、奥托·冯·波特林克(Otto von Böhtlingk, 1815—1904)等,还有诗人和翻译家弗里德里希·吕克尔特(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谢赛和大施莱格尔的一位学生,挪威-德国人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 1800—1876)以其四卷本的名著《印度古代文化研究》(*Indische Alterthumskunde*, 1844—1862;第一、二卷第二版 1867—1873),在德国建立印度古代文化研究(Altertumswissenschaft)这一学科。在法国,最伟大的印度学家是谢赛的继任者欧热恩·布诺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他和拉森合作发表了《论巴利语》(*Essai sur le Pāli*, 1826)和《印度佛教史介绍》(*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1844),介绍了巴利和佛教文学。

19世纪后半期的古代印度研究——吠陀领域的开拓

自19世纪40年代起,随着吠陀研究领域的开拓,梵语的语言研究又有了新的养料。这个时期,英国和欧陆的研究联系紧密;而法国巴黎由于布诺夫的去世,失去了欧洲印度学中心的地位。布诺夫的一位学生鲁道夫·罗特(Rudolph Roth, 1821—1895)发表的《吠陀的文学和历史》(*Zur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 des Weda*, 1846)一文,不仅是德国吠陀研究的开端,也让吠陀研究成为了梵语语文学最重要的代表。布诺夫的另一位学生则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斯·缪勒

(F. Max Müller, 1823—1900),1849—1874年他陆续出版了六卷本的《梨俱吠陀》(*Rgveda*)本集和沙耶那(Sāyana)的注释;还主编了《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其他的还有泰依多尔·奥夫莱希特(Theodor Aufrecht, 1822—1907)出版的《梨俱吠陀的拉丁字母本》(1861, 1863)、泰依多尔·本菲(Theodor Benfey, 1809—1881)编译的《娑摩吠陀》(*Sāmaveda*, 1848)、阿尔布莱希特·韦伯(Albrecht Webber, 1825—1901)编辑的《白夜柔吠陀》(*Yajurveda*, 1852—1859)、罗特与美国人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合编的《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 1856),同时身为数学家的赫尔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ßmann, 1809—1877)和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Alfred Ludwig, 1832—1911)分别翻译了《梨俱吠陀》(1876/1877, 1876—1888)。在辞书方面,波特林克与罗特合作的巨著《圣彼得堡大辞典》(*Petersburger Wörterbuch*, 1852—1875),以及前者另编的篇幅缩减但词汇增加的《梵语辞典简编》(*Sanskritwörterbuch in kürzerer Fassung*, 1879—1889),至今仍然是印度学首选的、无可替代的工具书。此外,还有格拉斯曼的《梨俱吠陀》辞典》(*Wörterbuch zum Rigveda*, 1875)。

专业化时期

自19世纪70年代起,印度语文学和语言学间的联系不再紧密。比起语

言上的问题,相当一部分语文学家们更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上的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比如乔治·波勒(Georg Bühler, 1837—1898)、弗朗兹·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 1840—1908)、加尔伯(Garbe)、希勒布兰特(Hillebrandt)、约利(Jolly)、雅科比(Jacobi)、库恩(Ernst Kuhn, 1846—1920)、贝尔加涅(Bergaigne)、赫尔曼·奥登贝尔格(Herrmann Oldenberg, 1854—1920)、凯尔纳(Kellner)、卡佩勒(Cappeller)、保尔·道依森(Paul Deussen, 1845—1919)、查哈里亚(Zachariae)、里比希(Liebich)等。另外一方面,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与欧洲的其他语言相比,古代印度语言在语言史的地位也变得不那么举足轻重了。尽管如此,在古代印度语言领域,语文学家卡尔·盖尔德纳(Karl Geldner, 1852—1929)、庇歇尔(Richard Pischel, 1849—1908),语言学家布鲁克曼(Brugmann)、约翰内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贝尔特霍尔特·德尔布吕克(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巴尔托罗梅(Bartholomae)、雅可布·瓦克纳格尔(Jakob Wackernagel, 1853—1938),他们用印度日耳曼学的观点来解释印度语法中的问题,还是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佛教文学的研究随着英国学者托马斯·莱斯·戴维斯(Thomas W. Rhys Davids, 1843—1922)创建的“巴

利圣典学会”(Pāli Text Society, 1882)而迅速开展。而韦伯撰文《论耆那教的圣典》(Ueber die heiligen Schriften der Jaina, 1883, 1885)启动了耆那教研究。

自从英、法、德首先开展了梵文研究,此时欧洲各国都逐渐产生了印度学的代表人物,甚至在美国和印度也有相当一批学者接受并运用了欧洲批判性的语文学方法论。日益增强的专业化和分工化导致了印度学向着更深和更广的方向发展。很快地,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扩展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不会再有一位印度学家能独立完成所有学科分支的研究。由波勒于1899年开始出版,基尔霍恩、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和瓦克纳格尔继续主编的《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和古代研究概览》(*Grundriß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计划出版40册^①,足见当时印度学涉及领域之丰富。

现代

前述之研究方向互相交叉。尽管一战给欧洲带来巨大创伤,但印度学还是产生了很多旗帜性的领军人物,所谓的众多“学派”开始形成。这里就包括了我国印度学创始人季羡林(Hiän-lin Dschi, 1911—2009)先生的导师恩斯特·瓦尔特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的几位师长。有关他们的事迹,下文将详述。

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二战之前,

^① 因为种种原因,只出了32册。

印度学,特别是德国的印度学发展到了顶峰^①;而在二战后则开始显现颓势。虽然在20世纪的下半叶,印度学领域还是在各个分支涌现了很多堪称极致的研究成果,但21世纪随着欧洲教育体制一体化和研究战略的实用化,印度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大幅缩减,研究方向上日趋单一,佛教研究成为绝对主流,在学派方面又以瓦尔特施密特和埃里希·弗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 1898—1974)^②二人的门派为绝对主流。而在印度学范畴之外,非语文学为主导的“印度研究”和“南亚研究”也在日益侵蚀印度学的领地。^③

三

如前所述,目前印度学,特别是德国印度学的主流之一是瓦尔特施密特;而中国印度学基本也是由此传承而来。因此,这部分将以斯氏为中心,谈谈他上下游的传承,从而对曾经流派纷呈的印度学作一个管窥式的概览。瓦尔特施密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

佛教文献和艺术。前一个方向,他师从吕德斯、埃米尔·西格(Emil Sieg, 1866—1951),后一个则是阿尔伯特·格伦维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和阿尔伯特·冯·勒考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所传。下面就以他们的年庚为序,逐一介绍这四位大师。

格伦维德尔^④不仅长期指引着德国的印度和中亚考古,还与其助手勒考克^⑤以德国“吐鲁番考察”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而闻名。^⑥

1856年7月31日,格伦维德尔生于慕尼黑,他继承了身为画师的父亲的绘画天赋,毕业于慕尼黑的造型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但格伦维德尔并不满意这个职业。通过刻苦地阅读翻译文献,他越来越强烈地被东方的精神生活所吸引。于是,1876年他决心在慕尼黑大学学习东方学。他主要师从库恩和恩斯特·特伦普(Ernst Trumpp, 1828—1885),学习梵语、巴利语、阿缠斯陀语和印度宗教史。此外,他还致

力于古代文学和艺术的研究,这是从其高中开始就一直钟爱的。在1881年5月25日,他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论文为一个僧伽罗语的贝叶经写本佛亲(Buddhappiya)的《色相成就》(Rūpasiddhi)第六书。

当时的柏林皇家博物馆的主管正在为其印度分部寻找一名年轻的专家,而库恩推荐了格伦维德尔博士。1881年12月,格伦维德尔就任巴斯蒂安的助手。1883年5月,他的优异表现令主管部门委他以当时的“人类学馆藏和北欧古代馆藏”的临时主管助理一职,自10月起其职位又转为正式。1891年,他获得了教授头衔。

19世纪90年代,一个以佛教艺术与造像,以及中亚考古为中心的出版系列问世了;直到格伦维德尔去世,这一系列从未中断过。此外,它还包括一些有关各种喜马拉雅地区语言的辞书、无数译自藏文的译作,以及宗教史和民族学的研究作品。

格伦维德尔第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他的那部史诗性的著作《印度佛教艺术》(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第一版是1893年,1900年经修订出了第二版,1920年再版。在他那个时代,这本书对学界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如下的事件中感受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的一位评论员希望能将此书译成英语,因为

“在印度的考古学家应该人手一本”。在晚期佛教造像研究方面,他著有《蒙藏佛教神话》(Mythologie des Buddhismus in Tibet und der Mongolei, 莱比锡,19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新疆的巨大发现,使德国也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其中。1902年8月,在得到当时的枢密院顾问庇歇尔的支持下,格伦维德尔与其助手经由俄国到吐鲁番地区,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新疆考察。在1903年7月,考察队成员带着巨大的成果回到了柏林。在1902—1903年间、1904—1907年间和1913—1914年间所进行的德国在新疆的考察,部分由格伦维德尔(第一次、第三次)、部分由勒考克(第二次、第四次)率领。

直至1921年为止,格伦维德尔的主要工作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新疆发现的刊布与释读中。1899年他被巴伐利亚皇家科学院推选为合作成员,1905年他的论文《1902/03冬季的伊迪库车里及周边的考古工作报告》(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03)发表在科学院的论文系列中(慕尼黑)。紧接着又有一部长篇的1905—1907年考察工作报告《中国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寺庙》(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柏林, 1912)^⑦。在他的有关其第三次考察主

① 印度学及其相关学科一度被称为“雅利安语言和文化研究”(Arische Sprache-und Kultur-Kunde),如果除却政治上的因素,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科名称是最方便、最准确、最概括的。

② 奥地利著名印度哲学研究者,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

③ 参见段晴:《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敦煌吐鲁番研究》2011年第12卷,第1—14页,第1页及注1。

④ 斯氏生平,可见瓦尔特施密特发表在1935年的《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新第11期,第215—219页上的追思文;后亦见贝歇特(Heinz Bechert)和基弗-佩尔茨(Petra Kieffer-Pülz)所编的瓦尔特施密特《短文选》(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斯图加特1989,第6—10页。

⑤ 斯氏生平,可见瓦尔特施密特写于1930年的《柏林博物馆》(Berliner Museen)杂志第51期的第52—53页上,后收于贝歇特和基弗-佩尔茨所编的瓦尔特施密特《短文选》,第4—5页。

⑥ 二人生平的汉译,可见笔者所译《吕德斯与西格追思》,《西域文史》第4辑,2009年,第303—309页。

要工作地的图版作品《古代库车——公元1至8世纪佛窟壁画的考古和宗教史研究》(Alt-Kutscha, archäologische und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an Tempera-Gemäld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 der ersten acht Jahrhunderte nach Christi Geburt, 柏林, 1920)中,这一研究得以继续。

1904年格伦维德尔被提名为博物馆的部门主管,此后还被多次授勋,1916年他得到了枢密顾问的头衔。1921年,他从工作岗位退休。退休之后直至去世,他继续从事着蒙藏佛教研究,但该时期成果的学术价值存疑。

1830年4月21日,勒考克诞生于柏林的一个大商人的家庭。40岁前,他一直从商,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在40岁时,勒考克才开始其学术生涯。1902年秋,他转入了(博物馆的)印度分部,从事首次吐鲁番考察所得的突厥语的摩尼教文献的整理工作。1904年秋,他被吐鲁番委员会派去参加第二次新疆考察团。1913—1914年,第四次考察又由他所率领。

1907—1930年间,除所有日常事务之外,在学术作品方面他也十分高产。一方面他以突厥学家的面貌示人,刊布了吐鲁番藏品中的突厥语摩尼教文献。他的工作凝结在不计其数

的会议报告和普鲁士科学院的论文之中。其中有摩尼教研究(Manichaica)I—III(1911—1922)和他根据英国和德国写本所刊布的摩尼教居士忏问文(1910—1911)。另一方面则是(反映)他考古成果的皇皇巨著《高昌》(Chotscho, 柏林, 1913)^①和《中亚的晚期佛教古迹》(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全六册, 柏林, 1922—1928)^②。此外,他还有数目可观的、有关新疆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作品(比如《新疆之民俗》[Volkskundliches aus Ostukistan], 柏林, 1916;《中亚艺术和文化史图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柏林, 1925)^③, 还有两部游记(1926和1928)。他的关于中国艺术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受到了(外来)古代(文化)的影响(《新疆的希腊痕迹》[Auf Hellas's Spuren in Ostturkistan]^④)的论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不知疲倦地将(中国艺术的)非独立性在其“发展序列”上展示,而且还致力于推翻中国艺术是完全独立地发展的这一空想。

1914年4月1日,勒考克成为主管助理(管理员Kustos)。九年之后,1923年4月26日,他被授予职衔“主管”,并被委任掌管印度分部,1925年退休。

格伦维德尔和勒考克二人被视为德国印度艺术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他

们在作为印度学根本学问的语文学上也有相当不错的造诣。这定下了德国印度艺术研究始终立足于文献的发展基调,同时它也始终容纳在印度学范畴之内。^⑤他们所主持的四次吐鲁番考察,也为德国今后一百年的印度学和东方学提供了无比丰富和宝贵的学术史和语文学研究资料。除了他们二人,特别是勒考克本人外,这一大批新资料的第一批受益人还包括吕德斯^⑥和西格^⑦。

吕德斯于1869年6月25日出生在吕贝克(Lübeck)。其学术生涯开始于哥廷根(Göttingen),在那里,这位年轻的学者获取了成就其碑铭释读和印度史诗校勘两项伟业的基础材料。当时他是基尔霍恩的学生。基尔霍恩是印度语法和碑铭方面令人仰止的大师,他的学问一部分来自印度本土学者班智达(Pandit),一部分来自欧洲的教育。吕德斯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完全受到了他的影响。1891年,吕德斯因一篇获奖文章而博士毕业,基尔霍恩培养他从事印度碑铭的编订工作。从1896年起,他为《印度碑铭》(Epigraphia Indica)杂志撰文,做出了很多贡献。这项工作的顶点是1912年E.I.第10期中的一个附录《从最初时到公元4世纪除阿育王时代之外的

婆罗迷铭文列表》(A List of Brahmi Inscrip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about A.D. 400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soka)。这一成果奠定了吕德斯作为碑铭学家的声誉,在其一生中这一领域的研究一再使他着迷。

1895—1899年,吕德斯担任牛津大学印度研究所的助理管理员和图书馆员。1898年,在其完成在英国的任务之前,吕德斯以作品《关于〈摩诃婆罗多〉的伽兰他修订本(史诗研究I)》(über die Grantharecension des Mahābhārata [Epische Studien I])通过了其在哥廷根的教授资格考试。这位年轻的学者在文中展示了对这部印度伟大史诗的诸多问题的看法和压倒性的批判态度。他的作品催生了重修《摩诃婆罗多》的计划,后因一战而无法实现。

1903—1908年,吕德斯起初以梵语和印度日耳曼语言学的编外教授,后以正式教授身份受聘于罗斯托克大学(Universität Rostock)。后来他又在基尔(Kiel)工作了半年。而后他去了柏林,这一职位意味着他学术视野的一个转折点和人生的一段重要篇章,尽管他仍然没有放弃早年的工作领域。他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

^① 中译本为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 中译本为管平、巫新华译《新疆佛教艺术》,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③ 中译本为赵崇民译《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中译本为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物宝藏》(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 参见拙作《德国佛教艺术史研究方法举隅:以九色鹿故事为例》,待发表。

^⑥ 斯氏生平,可见瓦尔特施密特发表于《研究与进展》(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1943年(8月)第19期,第250—252页上的追思文;后收于贝歇特和基弗-佩尔茨所编的瓦尔特施密特《短文选》,第11—13页。

^⑦ 斯氏生平,可见瓦尔特施密特所撰的追思文,ZDMG(101)1951,第18—28页;后收于贝歇特和基弗-佩尔茨所编的瓦尔特施密特《短文选》,第14—24页。

^⑧ 二人生平的汉译,可见笔者所译《吕德斯与西格追思》,《西域文史》第五辑,2011年,第243—254页。

域，并在未来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学术成熟期之后，收获期接踵而至。

格伦维德尔和勒考克从新疆携回的写本，保存在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它们等候着被编辑整理。尽管大部分写本残破不堪，但它们幸运地遇到了吕德斯。对这项任务而言，他的碑铭研究工作是绝好的前期准备。拼接和释读写本残片这一艰苦卓绝的琐碎工作开始了，他的夫人艾尔瑟·吕德斯(Else Lüders)给予其夫君无与伦比的支持。对于重要的事物，吕德斯可靠的眼光迅速导致了诸多引起轰动的发现。被他发现的《佛教戏剧残片》(*Brück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证实了一种至今未曾被预料到的印度人戏剧作品比以前所有熟知的都早数百年，以及古代文学的方言形式的存在。二十年后，吕德斯在《童受的〈大庄严论经〉残片》(*Brückstücken der Kalpanāmaṇḍitikā des Kumāralāṭa*)中发现了这部佛教作品，之前我们仅知道它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佛教诗人，但未有作品存世。此外，他还主持和推动了普鲁士科学院东方学委员会(Orientalische Kommissio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进一步细分工作。在他博学的妻子的协助下，梵文写本的编目和转写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在写本整理工作之外，他还致力于考古研究，这也是出版新疆的梵文医学文献所引发的。他写了《新疆的历史和地理》(*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istans*, 1922、1930)、《古代新疆的织物》(*Textillien im alten Turkistan*,

1936)，以及《关于新疆南疆的古卢体(Kharoṣṭī)文书的研究》(1936)。多年以来，通过对他微小得不能再微小的写本的研究，他还试图重构一部他所著的《出耀经》。

1930年前后，吕德斯达到其研究的顶峰。在普鲁士科学院和普鲁士科学学会的带头人地位，使其在德国成为德国的象征和德国科学的领袖。英-印政府高度评价了他在印度领域的工作，《印度碑铭集》(*Inscriptionum Indicarum*)中的文章将问世，他们再次把出版任务交给他。同时，吕德斯欣慰地看到了他所计划的《摩诃婆罗多》新修订本将问世，而且是在印度本土。他的学生Sukthankar(维拉·苏克唐伽尔(V. S. Sukthankar))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团队进行了这一项艰巨的工作。在访问印度之后，他以“古代印度的真理的魔力”的就职演讲，就任柏林大学校长一职(1931—1932年)。1935年，他从柏林大学退休。

1940年，出版了《印度语文学——同仁、朋友和学生们于1939年6月25日为海因里希·吕德斯七十寿诞所作之祝寿文集》(*Philologica Indica, Heinrich Lüders als Festgabe zum 70. Geburtstage am 25. Juni 1939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这本文集遴选了他散落在各处的短文，有些很久没有再版了。它们被收录于一册之中，阅读非常方便。单这一册书就证明了作者在

印度学领域的博学多识。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一篇重要论著《古代印度的骰子游戏》(*Das Würfelspiel im alten Indien*)的重印版，以及一系列考据学研究、词源学和碑铭学文章，夹杂着涉及印度戏剧史、图像学和考古学的文化史探讨。到处可以感受到他令人惊叹的知识面。他同时涉足那么多领域，其深度又是旁人所无法企及的。在最后的几年里，吕德斯仍在努力完成一些细小的工作。如在ZDMG发表的《化妆——关于印度戏剧史的一点贡献》(*Nepathyā,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indischen Theaters*)、《从印度动物(说起)》(*Von indischen Tieren*)等等。最后一个比较大的贡献是他在东方学论文系列(*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中发表(1941)的著作《巴尔胡特和佛教文学》(*Bhārhut und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数十年来，一部多卷本书籍的写作计划一直萦绕于其心，他满怀热忱地将之付诸笔墨。这部作品探讨的是以伐楼那(Varuna)为中心的《梨俱吠陀》(*Rgveda*)的一些问题。二战中，这部作品的手稿部分毁于战火，残存部分终于在战后由其学生瓦尔特施密特整理出版。

诸多荣誉和身份见证了吕德斯的国际声誉，他曾是方家与同仁的一颗指路明星。自从1909年起，他就是普鲁士科学院(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院士，从1920—1938年他一直是科学院的四位常务秘书之一；1924年，他被授予科学与艺术成就骑士勋章(Ritter des Ordens Pour

le Mérite)，1931年成为骑士团的次长，同年当选为柏林大学的校长，并于1932年获得了为科学和艺术而设的歌德奖章(Goether-Medaille)。他还曾是罗斯托克大学的名誉会员(1919)、莱顿(Leiden)科恩研究所(Kern-Institut)的名誉会员(1928)、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的名誉会员(1931)、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1)和伦敦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名誉会员(1932)、无数科学院的外籍和通讯院士；并且自1922年起，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的代理主席。

然而在大众中间，吕德斯的名字并不如其他印度学家那么为人熟知，因为一般人要了解其学问并非易事。印度学所有分支中的新知识源源不断地向他涌来，以至于除了有时做些报告之外，他终身都耻于从事二手文献工作、撰写普及性读物和主编文集。他的毕生巨著，正如他留给我们的，主要有两类：1. 细致入微的文献考据。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析问题，以严谨和紧凑的风格行文，其作品对读者的要求很高。2. 伴以大胆的想象的知识汇总。它既可以使得这位大师免于忘记各个知识间的宏观联系，又能让他时而在这个领域，时而在那个领域，进行开拓创新。他这样的学风和文风，也或多或少地传给了他门下的很多学者，包括瓦尔特施密特和季羡林。

1866年8月12日，埃米尔·西格

诞生于布莱腾泰希(Breitenteich)，是一位磨坊主和地主的儿子。1885年，他进入了柏林大学(University Berlin)，学习古典学。其间，利用在慕尼黑短期访学的机会，他投入恩斯特·库恩门下学习梵语。1891年7月31日，西格博士毕业，其博士论文是一篇有关吠陀文献的语音的作品，用拉丁语写就，题为“婆罗堕婆闍之学，第一部分”(*Bhāradvāja sīkṣā, Pars prior*)；1892年在柏林出版了其修订本《婆罗堕婆闍之学——拉丁译文与评论、批语和注释选》(*Bhāradvāja sīkṣā cum versione latina, excerptis ex commentario, adnotationibus criticis et exegeticis*)。该作品敬献给了他在柏林的老师韦伯。韦伯或许是19世纪下半叶最为博学的印度学家，他以柏林梵文写本目录、《白夜柔吠陀》的合集、第一部印度文学史，以及《印度巡礼》(*Indische Streifen*)和《印度研究》(*Indische Studien*)的作者与编者而著名。韦伯在语言学、文学和宗教学方面皆有造诣，是西格进入印度语文学领域当仁不让的引路人，当时该领域还鲜有人问津。从他那里，在新领域的开拓、未知事物的探索，以及将此转化为可靠知识方面，西格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其日后研究的动力。除韦伯之外，还有施密特，自1876年起他在柏林教授比较语言学，成了西格在印度日耳曼语言学领域的老师。

在柏林，西格也听过奥登贝尔格、道伊森和盖尔德纳的课程，在其博士论文里他们也同样被称为其老师。奥

登贝尔格以其重版多次的著作《佛陀——他的生平、教义和僧团》(*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und seine Gemeinde*, 1881)而闻名，还有其所编辑的与前者几乎同时问世的五卷本的(巴利)《律藏》(*Vinayapitaka*, 1879—1883)。其间，他(指奥登贝尔格)在柏林获得过副教授(Extraordinariat)的头衔；1889年，他离开柏林，赴基尔(Kiel)担任正教授(Ordinarius)。几乎在同时，道伊森以其《吠檀多体系》(*Systems des Vedānta*)在柏林通过哲学系(印度哲学方向)的教授资格考试之后也来到了基尔，担任那里的哲学系正教授。对西格来说，最后要提的那位更加重要，那就是罗特的学生盖尔德纳。1875年，盖尔德纳在蒂宾根博士毕业；1878年，又在该地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1889年，作为奥登贝尔格的继任者，他来到了柏林。1887—1889年，他在哈勒(Halle)担任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其间与该地的正教授庇歇尔交往甚密。在完成《阿维斯陀》(*Avesta*)的新勘本(1886年第一册)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吠陀研究。他与庇歇尔一道，在1889年出版了《吠陀研究》(*Vedische Studien*)的第一分册。在此书中，他们二人系统地与一种当时流行的、备受其师罗特所推崇的吠陀研究的风气对抗。这两位学者主要针对四种纰漏或疏忽：“1. 针对忽视印度传统和同经典梵语之间过少的联系(罗特及其门生)；2. 针对语言学解释方法的过高评价，以至于将吠陀从印

度文学中剥离，与印度古代史分开(德尔布吕克、格拉斯曼)；3. 针对《梨俱吠陀》古风的夸大，由此人们将其产生年代移至印度日耳曼的史前时代，并将其文化描述为原始民族的文化(缪勒、惠特尼、布隆霍法[Brunhofer]、茨默[Zimmer])；4. 针对吠陀神话中的印度日耳曼，或者唯雅利安特征。《梨俱吠陀》毋宁是一座印度的纪念碑，应如是理解和阐释，而整个印度古代史的构建也应服从此目标。无论如何，在吠陀中，无不应诠释为非印度的。”^①盖尔德纳无疑被西格视为韦伯之外的另一位导师。

博士毕业之后，1892年西格再次进入了高校，这次是在哥廷根，为期仅一个学期。作为印度本土语法的专家，他被基尔霍恩招致麾下。他从中获益匪浅，以至于他成为了能够阅读和教授波你尼的著名注疏《大疏》(*Mahābhāṣya*)及其再注疏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学家中的一员。他与吕德斯这位未来的哥廷根编外讲师相与颉颃，令西格颇为自得的是，他在慕尼黑将吕德斯争取过来学习梵语。

在盖尔德纳的鼓励下，1896年西格在柏林完成了其教授资格考试论文。该论文在四开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800多页，保留在其遗物中：晚期吠陀对《梨俱吠陀》传说素材的注释和其他文学报告，他进行了汇编与分析，而后做了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样

本”。一部分材料在西格于1902年出版的作品《〈梨俱吠陀〉和印度故事传统的传说素材》(*Die Sagenstoffe des Rigveda und die indische Itihāsatradition*)中修订并刊布。

吐鲁番考察队所携回的文献中，埃米尔·西格接手了用所谓的中亚婆罗米文写本的研究任务。1907年在《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以下称 SPAW)中，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他的文章立足于基尔霍恩学派，题为《在中国突厥斯坦的胜金口(Sängim-Ägiz)所发现的梵语语法残片》(*Bruchstück einer Sanskrit-Grammatik aus Sängim-Ägiz Chinesisch-Turkistan*)。第二年，他又接着发表了第二篇论文《在中国突厥斯坦新发现的梵语语法残片》(*Neue Bruchstücke der Sanskrit-Grammatik aus Chinesisch-Turkistan*)。

西格在他过去的学生威廉·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协助下，处理过一组婆罗迷文的写本。它们因为一些特别之处而引人注目，一开始无人能理解，直到西格和西格林在一些双语写本中找到了可靠的切入点。1908年，这两位学者向《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ungsberichten der Berliner Akademie*)提交了引起极大轰动的论文《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的语言——关于一种至今未知的印度日耳

^① 参见《印度伊朗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第7期，1929年，第3页，他为盖尔德纳所撰之追思文。

曼文学语言的临时注释》(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他们提供了不可推翻的证据,证明了这一新的语言起源于印度日耳曼语,甚至是印欧语的旁支,毋宁说是一种印度雅利安语。1916年,西格在《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中与突厥学家F. W. K. 缪勒(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一道,在题为《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吐火罗语之名;此外,它有两种方言之别,暂名为吐火罗语A和B。^①

从此,外界的认可也不再远离西格。在十二年的编外讲师生涯之后,1909年,他获得了来自基尔的梵语和印度日耳曼比较语言学正教授的聘书,去接替转投哥廷根的奥登贝尔格的教职。1920年,奥登贝尔格过世之后,西格又即刻到哥廷根继任。在那里他找到了第二故乡、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和他最后的归宿。在那两所大学里,这位勤于静思、心无旁骛、淡泊世务的学者享受着同事们的尊重与信任,以至于在动荡的年代里,那些困难的、重要的岗位皆委托给了他。1918—1919年他任基尔大学的校长,1923年他在哥廷根担任哲学学院院长。就职哥廷根仅一年,他便当选为当地的科学院院士,而后(1942)成为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士。

然而,在吐火罗语的命名上,他陷入了与法国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也是印度学家希尔凡·列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的论战。后者在印度日耳曼学家昂图瓦恩·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的支持下,早在1912年间就刊布了一些巴黎的伯希和(Pelliot)写本和伦敦的霍尔纳(Hoernle)写本中的B文献,认为方言B并无特殊。列维由此成为一名在公开场合领先西格的对手,这两位竞争对手进行了多次论战。这场论战最终于1930年代后期以西格的胜利和列维的辞世而结束,但从中也凸现了法德两国不同的学风:列维会迅速地处理手中的文本编辑并得出结论,还擅长与汉文对勘;德国学者关注的视野相对集中,而且非常谨慎、缓慢地得出结论。

1921年,西格和西格林出版了题为《吐火罗语言残余》(Tocharisch Spralreste)的两卷本著作。1931年,他与柏林的印度日耳曼学家威廉·舒尔策(Wilhelm Schulze, 1863—1935)合作,出版了长约500页的《吐火罗语法》(Tocharische Grammatik)。作为他们在柏林B方言文献上的第一个较大的成果,西格和西格林整理了著名的佛教格言集《出耀经》(Udānavarga)译成吐火罗语的注释,这是一个篇幅巨大的残卷。

1946年西格林去世,他的辞世对西格的打击非常大,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超过四十年的友谊抱憾而终。他们两人幸

福的合作关系——西格的勇往直前,加上西格林的小心谨慎——被破坏了。后来,维尔纳·托马斯(Werner Thomas, 1923—2008)成为他新的助手。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西格还为其他国家培养了杰出的吐火罗语专家,比如比利时的库弗尔(Couvreur)和美国的莱恩(G. Lane),当然还有季羨林先生。

从吕德斯和西格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新材料的现世令他们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到佛教文献上,但他们都有极为深厚的吠陀学、比较语言学的底蕴,佛教写本和语言的研究只不过是他们厚积薄发的一个层面。换句话说,他们学术上的显赫地位并不依赖于是否在有生之年遇到什么新材料;如果手头没有吐鲁番的文献,他们同样是伟大的印度学家。他们的学生瓦尔特施密特也同样如此,尽管他将吐鲁番文献的梵语部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的印度学研究兴趣和成果的多样性也足以使之成为那个时代的学科代表人物:德国东方协会的第二主席(1948—1952)、第一主席(1952—1959),第二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大会的主席(1957,慕尼黑),长年的荣誉会员。

四

1897年7月15日,瓦尔特施密特生于吕嫩(Lünen)。18岁生日时,适逢一战,他应征入伍皇家海军。在基尔

军港与道伊森相识,在后者建议下,他于1918—1919年冬季学期随西格在基尔大学学习印度学。道伊森的猝死(1919)以及西格赴哥廷根就职(1920)使得他离开基尔,去往柏林求学。他跟随吕德斯、舒尔策、富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学习印度学、藏文和汉语,1924年获得博士头衔。其论文题目是《说一切有部的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残卷》(Bruchstücke des Bhikṣum-Prātimokṣa der Sarvāstivādins),是以柏林所藏的中亚写本为基础的。博士毕业之后,吕德斯建议他担任勒考克的助手,为的是能更深入地参与吐鲁番写本和艺术品的整理工作。

当时,格伦维德尔是博物馆印度分部的首位主任,是国际上第一位印度艺术史学家。瓦尔特施密特不仅是勒考克的助手,还得到了印度艺术史学家海因里希·施蒂恩纳(Heinrich Stönnner, 1876—1939)的指点。另外,博物馆东亚部的F. W. K. 缪勒和蒙古学家费迪南德·莱辛(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也在那里工作。1925年,他出版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Gandhara, Kutscha, Turfan)^①,即对博物馆所藏的吐鲁番壁画及其他地区的艺术品的介绍。他还对摩尼教有兴趣,利用柏林所藏的汉语和伊朗语摩尼教双语歌集写卷,与沃尔夫冈·兰茨(Wolfgang Lenz)合作出版了《耶稣在摩尼教中的地位》(Die

^① 关于将吐火罗学归入印度学的原因,参见 *Einführung in die Indologie*, § 3。

^① 中译本为耿世民、齐树仁译《犍陀罗、库车、吐鲁番:新疆中世纪早期艺术导论》,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Stellung Jesu im Manichäismus)。1926年,他延续勒考克的前五卷,编写出版了第六卷的《中亚的晚期佛教古迹》(*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附上了《关于库车龟兹壁画的表现与风格》(über die Darstellungen und den Stil der Wandgemälde aus Qyzil bei Kutscha)一文,其中阐释详细,解读有关本生(Jātaka)和譬喻(Avadāna)题记的婆罗米字非常精准。

1929年他成为柏林博物馆的馆员,1930年他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论文是《中亚梵语佛经残卷》(*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Sūtras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kanon*),成为了柏林大学印度学专业的讲师。此时他与 Rose Leonore 结婚,1930年合作完成《南亚与高地亚洲的艺术织品》(*Das Kunstgewerbe Süd- und Hochasiens*)一文。1929—1933年,他撰写了一部至今仍然非常流行的普及性读物《佛陀生平传奇——梵语、巴利语和汉语佛经选译》(*Die Legende vom Leben des Buddha. In Auszügen aus den heiligen Texten. Aus dem Sanskrit, Pāli und Chinesischen übersetzt und eingeführt*),修订了格伦维德尔的经典著作《印度佛教艺术》,发表了《犍陀罗的泥灰塑像》(*Stuckplastik der Gandhara-Schule*),续编了《中亚佛教的晚期古典艺术》(*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的第七卷。1934年,他成为民族博物馆的馆员和教授,施蒂恩纳的继任者。1932—1934年,他们夫妇二

人赴斯里兰卡和印度旅行。

1936年,他成为其师西格的继任者,赴哥廷根从教。他的研究重心又转为文献学,西格已经在那里开创了吐火罗语的研究,他的到来以及后来吕德斯的离世,使得吐鲁番研究的中心从柏林转到了哥廷根。1939年,他出版了《关于〈大般涅槃经〉的文本历史》(*Beiträge zur Textgeschichte des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宣告其今后佛传写本研究的开始。

1939—1945年,他从军参战。1945年6月,当他从美国战俘营里出来时,得知其子于同年2月阵亡的消息。柏林所藏的写本移到了西德,但博物馆的藏品遭到了轰炸。

1947年吐鲁番写本研究得到了里夏德·哈特曼(Richard Hartman)领导下柏林科学院东方委员会(Orientalische Kommission der Berliner Akademie)的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及哥廷根科学院的支持,在东柏林出版“吐鲁番所发现的梵语文献”(*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系列丛书,由柏林科学院委任瓦尔特施密特主编。他著名的佛教写本编辑三部:《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四众经》(*Catusparisatsūtra*)、《大本经》(*Mahāvadānasūtra*),就先后在此系列下出版。这三部作品中,他不仅整理了梵文残片,还对勘了汉、藏、巴利语的文献;不仅就此确立了行规,而且引发了今后对佛教文本的部派归属研究。

在其退休之前,1965年出版了《吐

鲁番所发现的梵文写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以下简称SHT)的第一卷,将德藏的中亚梵文写本编目整理。这套丛书也是《德国东方写本目录》(*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的组成部分。在他有生之年,SHT就已经编辑了五卷。此外,他还发起并参与编修了《吐鲁番所发现的佛教文献梵语辞典》(*Sanskrit-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以下简称SWTF,1973—)。

当然,他也从未失去对印度艺术的兴趣。1967年,他与其妻合作完成了《尼泊尔,来自喜马拉雅王国的艺术》(*Nepal. Kunst aus dem Königreich im Himalaya*);在与佛教无关的印度细密画研究上,他们二人完成了《柏林印度艺术馆所藏的音乐灵感细密画》(*Miniatures of Musical Inspiratio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Berlin Museum of Indian Art*)两卷本(1966、1975)。

瓦尔特施密特无疑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一生作品数就超过100个。1971年,为庆祝其七十寿诞,出版了他的作品选集《从锡兰到吐鲁番》(*Von Ceylon bis Turfan*),单从书名就可以了解他研究范围之广博。同年,他入选为德国东方学会的荣誉会员。

对他身后的印度学发展,瓦尔特

施密特身体力行,毫无保留地贡献出了一切,他不仅将其住所和藏书捐给了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系,而且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五

在培养人才方面,瓦尔特施密特也是极为多产的。他的第一位博士生就是日后在中国为印度学开创一片天地的季羡林。^①二战之后,自从瓦尔特施密特主编“吐鲁番所发现的梵语文献丛书”起,就有一批年轻学者在他手下工作,得到他的指导和亲传,后来成长为印度学大家。

瓦伦蒂娜·施塔赫-罗森^②(Valentina Stache-Rosen, 1925—1980),原姓罗森(Rosen),结婚后依夫姓改为施塔赫-罗森,出身于外交世家,其祖父还是著名东方学家。1933—1937年,她就读于北京的德国学校,而她的祖父也在此期间病逝于北京。这段经历不仅使她对中国和汉语始终抱有好感,也让她今后成为了一名真正精通汉学的印度学家。

1944年夏季学期,她于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学院注册入学,专业为汉语、梵语和英语。1947年冬季学期,她继续哥廷根的学业,专业转为梵语、汉语和史前史。1950—1952年,她居住在伦敦,修学亚非研究所(School of

^① 段晴:《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第8页。

^② 有关斯氏生平,参见瓦尔特施密特所撰的追思文,ZDMG(132)1982,第22—28页,后收于贝歇特和基弗-佩尔茨所编的瓦尔特施密特《短文选》,第42—48页。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考古课程;而后回到哥廷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说一切有部的比丘尼波罗提木叉的律分别》(Der Vinayavibhaṅga zum Bhikṣuprātimokṣa der Sarvāstivādins, 1959年出版),这是其师瓦尔特施密特主编系列“吐鲁番所发现的梵语文献丛书”中的第二册。这份出色的作品乃是基于之前未知梵文残片的编辑。依靠完整保存下来的小乘说一切有部汉文译本,可知该残片是佛僧忏悔仪轨(*Prātimokṣa*)的注疏(*Vinayavibhaṅga*)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直接的对应文本,瓦伦蒂娜为整部汉译本作了详细分析,包括那些例外——许多意义不大的出家人威仪的规定,即所谓的“众学法”(*Saikṣa-dharma*)。

1954年末,瓦伦蒂娜赴印度普纳(Poona)的德干学院(Deccan College),在那里学习并参与由当地教授所主持的考古发掘。在她从普纳回到哥廷根之后,她接受了又一项编译中亚梵文残本的工作;这一次她工作的目标是《众集经》(*Saṅgītisūtra*)的残本,是一系列佛教名相的集合。另外,她在印度学系还参与了吐鲁番残卷的词汇卡片的编写。有时,她也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1960年,她结婚之后就随其夫辗转于亚洲的几个歌德学院之间。

1968年,她出版了题为《古代佛教的名相系列Ⅱ:《众集经》及它的注疏〈集异门足论〉》(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II: Das Saṅgītisūtra und sein Kommentar Saṅgītiparyāya)的著作,为“吐鲁番所发现的梵语文献丛书”的第九册,分两卷出版。有价值的是,这部出版物还附有汉译中所存的《集异门足论》的全译。在她作品的第二部分里,做了一份索引(梵-汉-德、汉-梵-德)和校勘记,其中罗列了众多的巴利文和其他对应文献的摘引。

1971年,瓦伦蒂娜在班加罗尔的歌德学院开始了第二段印度生活。她的学术兴趣扩展到民族生活和民族艺术方向上,并且总是放在延续古代传统和历史习俗的视角内。那个时期她的主要作品有:*Acharya Raghu Vira Commemoration Volume = Studies in Indo - Asia Art and Culture* 5 (1977), 第141—156页上《当代印度视听教育中一些古代形式的残余》(“Survival of some ancient forms of audiovisual education in present-day India”);《皮影和示图:印度宗教的民间娱乐的两种形式》(“Schattenspiele und Bildervorführungen. Zwei Formen der religiösen Volksunterhaltung in Indien”, ZDMG 126 (1976), 第136—148页);《南印度的双头鸟传统》(“Gaṇḍa-bheruṇḍa. Zur Tradition des doppelköpfigen Vogels in Südindien”, 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柏林1977, 第489—510页)。在佛教研究上,她还与瓦尔特施密特的另一位学生迪特·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 1928—)合作,为出版《僧伽军的〈本生〉诗歌》(Die Jātaka - Dicht-

tung des Saṅghasena)而做汉文资料部分的准备。她还为后者毕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阿旃陀(Ajantā)壁画研究中的汉文佛经中“本生”与“譬喻”部分,作了德文翻译。

1980年她从印度回到了德国,但不久因病去世。而中国和德国的印度学恢复交流正是在同一年,随着季羡林三十五年后重返德国才开始的。^①

赫伯特·海尔特尔(Herbert Härtel, 1921—2005)^②是瓦尔特施密特印度艺术研究领域的继承者。起初,在哈勒(Halle)他跟随保尔·蒂默(Paul Thieme, 1905—2001)学习梵语。而后,在哥廷根随瓦尔特施密特攻读博士学位,1954年2月23日获博士头衔。彼时他已经被指定为(西)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印度分部的主任。1956年,出版了他的写本研究专著《羯磨说——新疆梵文写本中的佛教僧团生活手册》(Karmavācanā, Formulare für den Gebrauch im buddhistischen Gemeindeleben aus ostturkistanischen Sanskrit - Handschriften)。

海尔特尔鼓动其师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艺术馆。瓦尔特施密特支持他的学生,在Essen-Bredeney召开的国际印度学家大会上作了倡议。1963年得到了普鲁士文化基金会(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的批准。

① 段晴:《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第13页。

② 有关斯氏生平,参见 Joachim K. Bautze, Obituary,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held at the Universiteit Leiden, 5–9 July, 1999, ed. Ellen M. Raven, Groningen: Egbert Forsten, 2008, pp. IX–XX.

1971年博物馆奠基。二战时,德国失去了很多印度艺术藏品,海尔特尔在任上,通过其独具慧眼的采购,使得藏品的数量增长到了世界级博物馆的水平。

1966—1974年,他在摩觉腊(Mathura)的宋卡(Sonkh)主持了8个年度的考古发掘。1993年出版了仙爛写的478页的报告(*Excavations at Sonkh, 2500 Years of Town in Mathura District*)。

战后德国有很多印度语文学的教席,但没有一个教席为印度历史而设。1959—1960年冬季学期,他得到了柏林自由大学的普通艺术史研究所的教职,开始了他教授印度艺术史的生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说服了研究所主任,同意将梵语设为印度艺术研究的必修课。1965年,作为一个与印度学并行的专业,印度艺术史专业终于在柏林自由大学成功开设。利用身兼大学和博物馆两个教授职位的优势,他在课上经常向学生展示艺术品的原件。1985年,他和奥博耶(Jeannine Auboyer)合作撰写了《普罗匹莱恩艺术史,第21册:印度和东南亚》(*Indien und Südostasien, Propyläen Kunst Geschichte* 21)。

1986年,他从主任位置退休。同年,博物馆为此召开“早期印度艺术中

的佛教和印度教发展与编年”会议。《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称他为“奠基主任”(Gründungsdirektor)。

海因茨·贝歇特(Heinz Bechert, 1932—2005)^①虽然不是瓦尔特施密特的学生,但他是其教职的继任者,同时也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其所开创的多项事业。1932年6月26日,贝歇特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1950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古典学和历史,在那里唤起了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他与后来成为海德堡大学教授的赫尔曼·贝尔格尔(Hermann Berger, 1926—2005)一道,求学于费迪南德·索默尔(Ferdinand Sommer, 1875—1962),后者在战后退休回聘。贝歇特对索默尔无比崇敬,后者的照片一直挂在其办公室的显著位置。学习了语言学之后,他进入了印度学,跟随印度伊朗学系的教授海尔穆特·霍夫曼(Helmut Hoffmann, 1912—1992)学习,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中亚梵语写本《旷野经》(*ātānātikasūtra*)的编辑。1961年,他还出版了《中亚梵语写本中佛教诗歌集残卷,〈无热恼偈〉和〈长老偈〉》(*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Verssammlungen aus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1. Die Anavataptagāthā und die Sthaviragāthā*),收入“吐鲁番所发现的梵语文献丛书”。该书对照了吉尔吉特、中亚的写本和藏文译本。他跟随霍夫曼学习了藏语,并且成为后者中巴伐利亚科

学院的藏德词典编撰的第一位合作者。虽然他日后不太专注于文献学,但他长年主持吐鲁番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并且自从他在博士论文中接触了律,作为一个律师的儿子,他对佛教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6年,他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的萨尔州大学的比较语言学和东方学的海尔穆特·洪姆巴赫(Helmut Humbach, 1921—)手下当助教。1958—1959年,在以“锡兰的古典和现代僧迦罗语言和文学研究”(*Studien über die klassische und die moderne singhales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Ceylons*)为名的项目之下,他远游斯里兰卡。

1961年,洪姆巴赫到美因茨大学担任比较语言学和印度日耳曼学的教授,贝歇特跟随他成为了印度日耳曼学的助教。1964年,他完成了教授资格考试,论文为《僧迦罗人梵语文学史》(*Geschichte der Sanskrit-Literatur bei den Singhalesen*),材料是他当时在斯里兰卡所搜集的。在他去世的前不久,该书终于出版,名为《南亚的地区文言传统:佛教僧迦罗的梵语文学》(*Eine regionale hochsprachliche Tradition in Südasien: Sanskrit-Literatur bei den buddhistischen Singhalesen*),由此开启了他对南亚佛教,特别是政教关系的关注。在德国外交部支持的“佛教政治活动”(*Die politische Aktivität*

des Buddhismus)项目之下,他着手南亚和东南亚的调研。他从事的研究是宗教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沿袭了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大胆的行径。他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三卷巨著《上座部佛教诸国的佛教、国家和社会》(*Buddhismus,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den Ländern des Theravāda-Buddhismus*),被称为“20世纪东南亚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尽管用德语写成,但影响广泛而深远。

在他完成教授资格考试后不久,他到波恩工作。仅仅一年之后,1965年,他到哥廷根继任瓦尔特施密特的职位,这意味着他重回吐鲁番研究。1968年,他当选为哥廷根科学院的成员。两年后,他接手了由瓦尔特施密特奠基的SWTF。他很乐意担当现如今所谓的“学术经理”这一身份,他充分利用了大学、科学院和第三方资助,把哥廷根的研究重点打造成佛教研究。他增加了很多职位,用以编纂SWTF。他还让哥廷根科学院承接了“德国所藏东方写本的编目”(*Katalogisierung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的三个项目:缅甸、僧迦罗和吐鲁番的梵语写本(SHT)的编目。在他有生之年,主编了SHT的第6—9册;SWTF的第一卷至第三卷,即第1—20分册。

1983年,他在斯里兰卡亲眼目睹了反对泰米尔人的大规模游行,这令他很难受。由此,他一直致力于在文献中寻找双方冲突的历史起因。

对佛教律的兴趣使他在南亚考察

时十分关注上座部僧团内的部派(Nikāya),还有佛教的现代化发展。在这些工作中,展现了他对纷繁芜杂的外界事物的归纳、整理、提炼和总结的能力。田野调查的结果,他能够迅速学术化。1988年,他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佛陀的生活年代。虽然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断代,但是他所集结的三卷会议论文全面展示了当时的最高研究水平。他还主编了《印度学入门》(*Einführung in die Indologie*, eds. Heinz Bechert & Georg von Simso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¹⁹⁷⁹, 2¹⁹⁹³),该书是印度学学习的必备手册。

贝歇特于2000年退休,五年后因病去世。

施林洛甫是唯一一位全面继承瓦尔特施密特所学——写本研究和印度艺术史研究——的弟子。他于1972—1996年担任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主任。在其任职期间,该系的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了佛教。他的作品有:《〈诗韵集略〉:关于梵语格律的文献》(*Chandovicitī, Text zur Sanskritmetrik*, 柏林 1958)、《中古佛教概念组——〈十上经〉IX—X》(*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1a, Das ottarasūtra IX—X*, 柏林 1962)、《佛教之一:僧团的解脱之道》(*Die Religion des Buddhismus, I Der Heilsweg des Mönchtums*, 柏林 1962)、《佛教之二:世间的解脱之道》(*Die Reli-*

① 有关斯氏生平,参见 Jens-Uwe Hartmann, Nachruf, in: ZDMG (158) 2008, pp. 1—7。

gion des Buddhismus, II Der Heilsweg für die Welt, 柏林 1963)、《佛教瑜伽课本》(Ein buddhistisches Yogalehrbuch, 柏林 1964)、《古代印度城市:一个比较研究》(Die altindische Stadt,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威斯巴登 1969),还有印度艺术史研究的登峰造极之作《阿旃陀——图画手册 1:叙事的壁画》(Ajanta – Handbuch der Malereien 1: Erzählende Wandmalereien, 威斯巴登 2000)。

此外,还有弗朗茨·贝恩哈特(Franz Bernhard)和劳瑞·桑德尔(Lore Sander)等人。前者在庇歇尔与吕德斯研究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出耀经》(Udānavarga, Band I, Einführung, Beschreibung der Handschriften, Textausgabe, Bibliographie, Göttingen 1965),了却了吕德斯的一个未完之遗愿。后者是 SHT 的编委之一,是一位梵文字体专家,她于 1968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柏林吐鲁番所藏梵文写本的书写》(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中修订了其前辈吕德斯的很多经典论断,该书至今仍然是写本研究最权威的工具书。

瓦尔特施密特的再传弟子和贝歇特的研究团队中,涌现了一批世界一流佛教和写本研究者,诸如乔治·冯·希姆森(Georg von Simson)、西格林德·迪耶茨(Sieglinde Dietz)、延斯·乌维·哈特曼(Jens-Uwe Hart-

mann)、克劳斯·维勒(Klaus Wille)、端严比丘(Bhikkhu Pāsādika)、Chung Jin-il(郑镇一?)等。他们的作品有:希姆森的《说一切有部的〈波罗提木叉经〉,在艾尔瑟·吕德斯与赫伯特·海尔特尔的基础上》(Prātimokāśāstra der Sarvāstivādins. Nach Vorarbeiten von Else Lüders und Herbert Härtel, Teil I, 1986, Teil II, Kritische Textausgabe, übersetzung, Wortindex, sowie Nachträge zu Teil I, Göttingen 2000),以及他与贝歇特合编的《印度学入门》;哈特曼的《摩哩咥吒的〈广赞功德赞〉》(Das Varṇarhavarṇastotra des Mātraceta, Göttingen 1987)和《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研究》(Untersuchungen zum Dirghāgama der Sarvāstivādins, Göttingen 1992);迪耶茨的《印度佛教书信文学:以藏文丹朱尔为据》(Die Buddhistische Briefliteratur Indiens: Nach Dem Tibetischen Tanjur, bonn 1980)、《法蕴足论》残片,一部吉尔吉特的梵文阿毘达磨经》(Fragmente des Dharmaskandha, Ein Abhidharma-Text in Sanskrit aus Gilgit, 1984)、与米歇尔·哈恩(Michael Hahn)合著的《通向正知的道路——佛教说法书信,由梵语和藏语翻译及编辑》(Wege zur rechten Erkenntnis – Buddhistische Lehrbriefe. Aus dem Sanskrit und Tibetischen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Berlin 2008);维勒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事写本传承》(Die handschriftliche überlieferung des Vi-

nayavastu der Mulasarvastivadin, Stuttgart 1990);端严比丘的《世亲的阿毘达摩俱舍论中的经文引用》(Kanonische Zitate im Abhidharmakośabhadra des Vasubandhu, SWTF Beiheft 1, Göttingen 1989);Chung Jin-il 的《受戒事——说一切有部律中的佛教》(Das Upasampadāvastu. Vorschriften für die buddhistische Mönchsordination im Vinaya der Sarvāstivāda-Tradition. Sanskrit – Version und chinesische Version, SWTF Beiheft 11, Göttingen 2004)。SWTF 在哈特曼的主编下目前完成了第 21—23 分册;SHT 在维勒的主编下完成了第 10 册,而第 11 册也即将出版。此外,吉尔吉特(Gilgit)写本的研究已成为与吐鲁番写本同样重要,先后有几位中国学者也参与了其中律部和经部——主要是《长阿含》(Dirghāgama)的研究。

还有印度艺术史专家,诸如阿德尔贝尔特·盖尔(Adelbert J. Gail),其作品有:《薄伽梵往世书》中的“奉献”》(Bhakti im Bhāgavatapurāṇa, Wiesbaden 1969)、《持斧罗摩、婆罗门和武士》(Parashurāma, Brahmane und Krieger, Wiesbaden 1977)、《尼泊尔的寺庙》(Tempel in Nepal, Graz vol. 1 1984, vol. 2 1988)、《尼泊尔的寺院》(Klöster in Nepal, Graz 1990)、《印度的太阳崇拜》(Sonnenkult in Indien, Berlin 2001);莫妮卡·茨茵(Monika Zin),她的作品有:《阿旃陀——图画手册 2:供养和装饰绘画》

(Ajanta – Handbuch der Malereien 2, Devotionale und ornamentale Malereien, Vols. 1—2, Wiesbaden 2003)、《慈悲和神通——印度佛教中的艰难皈依及其造像》(Mitleid und Wunderkraft. Schwierige Bekehrungen und ihre Ikonographie im indischen Buddhismu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与施林洛甫合著)《轮回轮——印度传统中的转世之轮》(Saṃsāracakra, Das Rad der Wiedergeburten in der indischen Überlieferung, Düsseldorf 2007);玛丽娜·雅尔迪茨(Marianne Yaldiz),她的作品有:(与海伊特尔合著)《丝绸之路:柏林印度艺术馆所藏的佛教寺庙绘画与雕塑》(Die Seidenstraße, Malereien und Plastik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tempeln aus der Sammlung des Museums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 Berlin 1987)、《中国中亚(新疆)的考古和艺术史》(Archä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 [Xinjiang], Leiden 1987)。

如果说,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印度学发展至今,是一棵参天大树从根部成长到了枝叶,那么这部分枝上的树叶确实非常茂盛,而那棵大树本应每根枝干上都萌发出绿叶来。

六

有关我国的印度学发展史,有很

多资料一再谈到,^①重复部分这里将不再赘述。

中国印度学真正建立的标志,还是季羡林于二战之后回到中国后,北大成立了语言系。但是,不能被忘记的是爱沙尼亚印度学家刚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él - Hotstein, 1877—1937),他于1920或者1921年来中国^②,主持了哈佛燕京学社所属的中印研究所。他也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印度学研究方法的人。1926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为我国学界展示了多种语言对勘的语文学研究规范。而国内再次出版同类学术著作,则是八十年之后了。

受刚和泰影响的不仅有陈寅恪,还有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学家林黎光(Lin Li-kouang, 1902—1945)^③。在担任刚和泰的助理期间,他随之学习了梵文、藏文,并曾编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汉梵索引》,但未刊行。1933年林黎光赴法国,在列维和路易·雷奴(Louis Renou, 1896—1966)指导下从事尼泊尔的写本研究。由于二战时环境艰苦,他积劳成疾,于1945年不幸逝世,得年仅43岁。林氏

去世后,其校订研究《诸法集要经》之成果,由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等学者整理,于1946—1973年分为四册出版:《正法念出经,即诸法集要经介绍》(*Int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 Dharma-samuccaya, 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Paris 1949);《正法念处经》(*Dharma-samuccaya, Compendium de la loi; recueil de stances extradites du 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 par Avalokitasimha*, 3 vols. Paris 1946—1973),此书被誉为20世纪对后期小乘佛学研究最重要之贡献,至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我国印度学家被引用最多的作品。非常可惜的是,他所学的法国的印度学学派因其早逝而未能在中国有传承。

如前所述,季羡林师从瓦尔特施密特,也同时随西格学习了吐火罗语。在德国留学及工作期间,他已经借其未发表的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大事》迦陀中的限定动词变位》(*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 Verbums in den Gāthās des Mahāvastu*, 1941),以及《吐火罗本〈福力太子本生〉的对应文

本》("Parallelversionen 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 Puṇyavanta-Jātaka", in: *ZDMG* (97) 1943, pp. 285—325)和《中古印度语从-aṁ到-o和-u的词尾转化》("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 -aṁ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in: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1949, pp. 257—280)等^①,在西方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

林黎光和季羡林两位先生为中国印度学的发轫起了高屋建瓴的榜样作用:他们的研究并非机械地刊布和处理一手资料并以此而自得,而是着眼于材料的语言和宗教史的分析;同时,他们虽有很高的国学素养,但也没有闭门造车,而是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非汉语的材料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最后,即便在西方人所擅长的领域里,他们的成就也是相当令人称道的。这不仅与当时印度学研究的大家之风有关,也同他们自身的学养和学术理想分不开。笔者以为,如果真要有中国特色的印度学,唯有以他们这两位大师为楷模。

季羡林回国之后,特别是在建国后,与金克木(1912—2000)等学者一起,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印度学,培养了黄宝生、郭良鋆、蒋忠新、张保胜、韩廷杰、段晴、胡海燕、王邦维、葛维钧、罗炤、李南等一大批研究人才。他们译介了相当数量的印度文学作品,为

印度文化及印度学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②

1980年季羡林重访德国哥廷根大学,从此开启了中德两国再度交流的大门。1990年代起,我国印度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开始为国际学界所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王邦维的《古代中国视角的佛教部派》("Buddhist Nikayas through Ancient Chinese Eyes", in: *Untersuchungen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 SWTF Beiheft 5*, Göttingen 1994),配合了贝歇特的佛教部派研究,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份提供了中国的观察视野;胡海燕(Haiyan Hu-von Hinüber)以《〈布萨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忏悔仪轨》(*Das Posa-adhavastu. Vorschriften für die buddhistische Beichtfeier im Vinaya der Mūlasarvāstivādins*, Reinbek 1994)参与了吉尔吉特写本中的律部研究;季羡林与维尔纳·温特(Werner Winter)、乔治-让·皮诺尔(Georges-Jean Pinault)合著的《新疆博物馆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片》(*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ṭ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Berlin 1998)成为了国际吐火罗语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李南校勘译注的《〈胜乐轮经〉及其注疏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标志着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界的密宗研究。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对梵文写

^① 比如,王邦维:《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八十年回顾》,《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98—104页;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载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南亚文化编》,昆仑出版社,2008年;等等。还有段晴:《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

^② 王邦维:《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八十年回顾》。

^③ 有关他的生平,可见 Paul Demiéville 在 Lin Li-kouang, *Int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 Dharma-samuccaya, 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Paris, 1949 中的导言及林黎光夫人李玮的序言。相关汉译和重印本,见戴密微撰,潘涛译,徐文堪校订《林黎光追思》,《西域文史》第五辑,2011年,第255—266页。该文的“译校按语”还罗列了其他有关林黎光的报道信息。

^① 这些作品后皆收入季羡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② 具体成果,可参见226页注①中所列文献。

本,特别是发现于西藏自治区的梵文写本的重视,北京大学的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分别出版了相关的系列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的丛书名为“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目前出版有:叶少勇所著《〈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中西书局,2011年)、《〈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范慕尤所著《〈无二平等经〉梵文写本的对勘与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

中国藏学中心则与奥地利科学院合作,出版了“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STTAR),中方主编为拉巴平措,奥方为弗劳瓦尔纳的弟子恩斯特·斯坦因凯勒(Ernst Steinkellner)。目前我国学者参与的著作有:蒋忠新所著《梵文〈法华经〉拉丁转写本》(Palm-leaf Manuscript of the Sanskrit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m, 1. Kept in the Potala Palace in Tibet, 2. Collected in the Norbulingga of Tibet, Written in A. D. 1065, 3. Collected in the Norbulingga of Tibet, Written in A. D. 1067, STTAR 3, 2006),李学竹与斯坦因凯勒合作的《世亲〈五蕴论〉》(Vasubandhu's Pañcasākandhaka, Critically edited by Li Xuezhu and Ernst Steinkellner with a contribution by Toru Tomabechi, STTAR4, 2008),罗鸿与苦米地等合作的《月称〈金刚萨埵成就法〉》

(Candrakīti's Vajrasattvani s pādanasūtra [Vajrasattvasādhana], Sanskrit and Tibetan Texts, Critically edited by Luo Hong and Toru Tomabechi, STTAR 6, 2009),罗鸿所著的《佛颠续·第9~14章》(The Buddhakapālatantra Chapter 9 to 14, Critical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uo Hong with a preface by Harunaga Isaacson and Alexis Sanderson, STTAR 11, 2010)、《无畏藏护〈无畏疏〉》(Abhayākaragupta's Abhayapaddhati Chapter 9 to 14, Critical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uo Hong with a preface by Harunaga Isaacson and Alexis Sanderson, STTAR 14, 2010)。

除上述两个机构之外,北京大学的陈明从事印度医学研究,他的作品有:《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敦煌出土胡语医典〈耆婆书〉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5年)。而中国社科院也在黄宝生的领导下,推出了以《梵汉对勘〈人楞伽经〉》、《梵汉对勘〈人菩提行论〉》(黄宝生译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为代表的梵汉对勘研究系列丛书。这为中国其他的印度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新思路:在没有新资料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深入的、不失学术价值的语文学研究。

当然,还有一些中国的印度学学者,他们直接在海外完成学业,并且通

过海外的渠道辗转得到了新资料,也包括在中国发现的新资料,得以为我国的印度学发展贡献力量。前面提到的吉尔吉特《长阿含》就有张丽香、刘震和周春阳三位中国学者,他们各负责一部经的研究,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刘震的《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①值得一提的是,张丽香除了写本研究,还从事了瓦尔特施密特的另一部分未传到中国的专长印度艺术研究,目前发表了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Padhānasutta:佛传中降魔悟道的起源——对巴利文、梵文及汉译佛典的比较考察》(《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2010年,第289—310页)。

非常巧合的是,上述中国的印度学者尽出于瓦尔特施密特一门。如今,还有两位弗劳瓦尔纳的再传弟子与中国的印度学有关:一位是研究印度数学、逻辑和正理派哲学的德国学者孤鹤(Eberhard Guhe),他的作品有《〈附设宝鉴〉教义》(Die Lehre von der zusätzlichen

Bestimmung im Upādhidarpaṇa, Wien, 1999)、《经典梵语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klassische Sanskrit — Ein Lehrbuch mit Übungen, Wiesbaden, 2008),目前在复旦大学工作;另一位研究佛教量论的中国裔学者褚俊杰,他的代表作是在维也纳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青年陀罗菩提对陈那的认识方式和感觉的概念解释(〈集量论〉的注疏〈集量论释〉I 2—5)》(Jinendrabuddhis Erklärung zu Dignāgas Definition der Erkenntnismittel und der Wahrnehmung [Pramāṇasamuccaya tīkā zu Pramāṇasamuccaya I 2—5], Wien, 1999),目前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工作。

令人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在国内外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印度学,而且学习印度学不同的研究方向。中国的印度学与世界接轨,不仅要接上枝叶繁茂的树冠,更要从粗壮的根部接起。

^① 相关信息,见刘震:《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第23—29页。